

# 长寿时代与长寿红利

杨菊华

**摘要:**“长寿时代”是一个比老龄时代更积极、更富前瞻性的概念。长寿时代、长寿社会与人口老龄化、老龄社会的概念虽有交叉却并不等同。长寿时代蕴含着长寿红利,包括人力资本日渐丰厚、经济资本大大提升、技术资本持续增强、社会资本不断延展等。激发长寿时代的长寿红利,须从延长长度、拓展宽度、挖掘深度入手,延展个体生命周期的生产性年龄时长,激发个体资本禀赋潜在的多维面向,突破长寿红利的浅表层次,在系统性的制度、组织、个体努力的多重保障下,助力长者都能实现自我价值,达成各享其益、各得其美、美美与共的社会目标。

**关键词:** 长寿; 长寿时代; 长寿社会; 长寿红利; 老龄红利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2.04.010

长寿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和医疗卫生条件的长足进步、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人类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在1998年“国际老年人年”启动大会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宣布“目前人类已进入长寿时代”。截至2021年,我国60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为26736万、2005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8.9%和14.2%,表明中国已由老龄化社会转入老龄社会。高龄长者的规模也快速增长,百岁人生更为可期,从未经历、前所未有的“长寿时代”已然来临。

人口年龄结构的颠覆性转变,无疑构成人类发展时间轴上的新特征与未来社会的人口新常态<sup>①</sup>。然而,面对这一社会进步的巨大成果,整体社会思潮却较为负面、消极与否定,总是给长者贴上“落伍、衰弱、疾病、负担”等标签,强调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如正在变老的人口老化了中国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提高了老年抚养比、加大了社会保障压力和各类服务需求等。但是,“长寿时代”不同于“老龄社会”,从“长寿”眼光来审视这一现象,可能得出正面、积极、肯定性和前瞻性的结论。

本文以“长寿时代”为切入点,尝试界定长寿与长寿时代这两个核心概念,分析长寿时代蕴含的长寿红利,探讨激发长寿红利的可能路径。长寿是人类社会长期努力奋斗、不断进步的结果;在小农社会,年长是成功的表征,长者多会受到家人与社会的敬重。长寿红利是指通过对长者各类资源和价值的认识、开发与利用而激发出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长寿时代的到来,必将重塑社会各种制度安排、组织结构与代际关系。面向新时代,秉持人类情怀、历史深度,坚持创新思维,探究新的人口特征及其演变逻辑,积极开发长寿红利,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事关积极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实现,也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大局。

## 一、长寿时代已然来临

中国自古就有“长命百岁”“颐养天年”之说。古代帝王多追求长生,普通百姓也希冀长寿。这些理想与行为折射出的,是人类在漫长岁月中过高的死亡率和很短的预期寿命。长寿作为健康的重要标志,只有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方可实现。

**作者简介:** 杨菊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人口与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1; Juhua\_Yang@muc.edu.cn)。

<sup>①</sup> 陈东升:《长寿时代的理论与对策》,《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

### (一) 长寿时代与长寿社会

何谓“长寿”? 何谓“长寿时代”? 对于这两个基础性问题, 目前仅有定性的描画, 却无明确的定义。长寿是一个动态且较主观的概念, 不同时代的认知有别。杜甫曾言, “人活七十古来稀”, 表明在死亡率很高的农业社会, 70岁可作为长寿的临界值; 意大利社会学家则提出, 只有年过76岁, 才算真正意义上的老年人<sup>①</sup>; 2002年, 世界卫生组织(WHO)规定, 45岁以下为青年人, 45-59岁为中年人, 60-74岁为年轻老年人, 75-89岁为老年人, 90岁及以上为长寿老年人, 100岁之人被称为寿星。

笔者认为, 寿命是界定长寿的最主要标准, “长寿时代”取决于出生人口预期寿命的高低。在个体层面, 若人均预期寿命不足最长理论寿命(约120岁)的60%, 很难说他是长寿的; 在群体层面, 若总体人群不能活过最长理论寿命的一半, 也很难说该社会就进入了长寿社会、该时代进入了长寿时代。以此为基, 笔者将长寿定义为70岁及以上。这与古人“人活七十古来稀”、当下“年过70才算老”<sup>②</sup>、人均预期寿命超过70岁的国家即为长寿国家的WHO的标准不谋而合, 当然, 这无疑是一个较低的长寿临界值, 将随寿命的进一步延长而进行动态调整。从群体层面看, 1996年,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超过70岁, 步入了长寿时代。

长寿时代、长寿社会与人口老龄化、老龄社会的概念虽有交叉, 却不等同。前者取决于人能“活多久”, 即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的顶端模态(绝对的量), 但后者同时取决于“活多久”(寿命)和“生多少”(生育率), 即金字塔顶端和底端特征(绝对的量、相对的比); 前者不可人为逆转, 后者却可通过生育行为进行改变。当然, 长寿时代也可以是一个相对概念。联合国将65岁及以上人口与0-14岁少儿人口的比值(老少比)超过30%的社会界定为老年型。2000年, 我国的老少比首次超过30%; 若以此为标准, 则中国进入长寿时代的时间比70岁的标准略晚几年; 2020年, 老少比高达75.2%。这将是未来3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国人口常态, 人口年龄结构从金字塔形一步步演化为底端收敛、顶部扩张的柱状。尽管相对定义具有流变性, 因为它同时取决于人活多久、生多少这两个参数, 但预测显示, 2050年前后, 65岁及以上人口将约占中国总人口的29%, 80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将超过1亿, 长寿特征只会更加彰显<sup>③</sup>。

若以人均寿命为本, 而非以生产资料的占有或生产工具的使用为基准, 则人类社会可划分为短寿时代、中寿时代、长寿时代。未达到普遍长寿的时代是一个旧文明时代, 而达到了普遍长寿的时代是人类的新文明时代<sup>④</sup>。人均寿命不断延长, 是人类进化和文明发展最大的成就, 是发展水平在微观个体身上的缩影与投射。当人们普遍活得更久, 个体生命周期和整体人口年龄结构后移, 人类社会就进入一个亘古未有且日渐稳定的新的长寿状态。长寿是一种不可逆转但有极限的人口特征, 这种特征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目标、手段、模式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是推动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sup>⑤</sup>。

### (二) 长寿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过高的死亡率使得出生人口预期寿命低于30岁(但这并不是说古人都只能活到二三十岁), 人口增殖速度缓慢, 年龄结构一直属于年轻型。工业革命后, 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和日常生活条件的改善, 使得死亡率快速降低, 人口数量出现爆炸式增长, 但直到1900年前, 出生预期寿命虽明显增长, 但都在35岁以下徘徊。二战后, 全球各国的人口预期寿命快速提升, 长者数量越来越多、人口年龄结构渐渐变老。2000年, 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首次超过10%, 标志着人类社会已步入了老龄化时代。当前, 尽管不同国家或地区人口老龄化的起点、进程、速度、结果相差甚大,

① 杨团:《从“负担”到“财富”》,《人力资源》2013年第3期。

② 杨菊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③ 杜鹏、李龙:《新时代中国人口老龄化长期趋势预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④ 杨团:《从“负担”到“财富”》,《人力资源》2013年第3期。

⑤ 孙家驹:《创新社会管理 收获长寿红利》,《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但全球中等以上收入国家普遍行进在人口老龄化之路上,多国人均预期寿命超过 70 岁,日本超过 80 岁。换个角度看,普遍长寿已构成人类文明的新标识;而且,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有望将人类寿命延长 30%以上<sup>①</sup>,长寿是 21 世纪全球人口的基本特征和共同未来。

中国也是如此。因史料缺乏,我们很难获得古人甚至近代人口精确的出生预期寿命,但概而言之,直到晚清时期,国人的预期寿命约介于 20-40 岁之间,缓慢增长<sup>②</sup>;1930 年代,出生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约为 35-37 岁<sup>③④</sup>;在民国早期统计的各年龄段死亡人口中,1-5 岁夭折为最,但一旦熬过婴幼儿期,35 岁后死亡率才逐渐上升,50 岁尤其是 55 岁后死亡率才明显升高<sup>⑤</sup>。

出生预期寿命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综合指标。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环境恢复和平,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事业逐步发展。1949-1957 年,人口死亡率从 20.0‰ 降至 10.8‰,人均预期寿命从 35 岁升至 57 岁。此后,在摆脱贫穷落后、全面解决温饱、实现基本小康、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一次次历史性跨越发展中,出生预期寿命也实现了一次次跨越:1970 年代超过 60 岁,1990 年代超过 70 岁,2019 年升至 77.3 岁。如果说,从文明社会形成以来到民国时期,人口预期寿命增长一倍约花了 4000 年时间的話,新中国成立后,寿命翻番仅用了 70 年的时间。今天,人活七十绝非古稀了。而且,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的追踪调查显示,绝大多数 60 多岁的人并未认为自己已经老了。而且,可能因为年龄选择效应之故,年纪越大,主观老化年龄越大(见表 1);也就是说,老年人自身有着更为积极的老年观。

表 1 对“多少岁开始变老”的主观认知(单位:岁)

	2014	2016	2018 年
全体样本	70.05	70.91	69.70
分年龄组			
60-64	67.56	69.70	67.96
65-69	68.98	70.42	68.39
70-74	71.08	70.78	69.70
75-79	72.76	72.28	70.47
80+岁	75.91	73.51	73.77
样本量	8536	10836	10120

资料来源: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

### (三)长寿时代挑战“三段式生命周期”

长寿时代悄然但快速来临。因为悄然,社会的有效反应尚在摸索之中;因为快速,社会方方面面的准备都还刚刚起步。目前,学界、政府和社会过多强调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由此产生对长寿时代片面和消极的认识,给它贴上“银色海啸”“老人社会”“人口红利消失”等负面标签。

对“老”的恐惧心态,折射出视长者为闲人、失用之人的旧思维。“老”不仅仅受制于生理状况,也是一种社会建构。迄今,个体一生被划分为三大阶段——学习期、工作期和退休期(养老或颐养天年期)。“三段式生命周期”原本具有尊重与孝敬长者之意,但后者将退休人群建构为“老”,造成代际之

① 杨团:《从“负担”到“财富”》,《人力资源》2013 年第 3 期。

② 林万孝:《我国历代人的平均寿命和预期寿命》,《生命与灾祸》1996 年第 5 期。

③ Seifert H. E.,“Life Tables for Chinese Farmers”,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 1935,13(3), pp.223-236.

④ 侯杨方:《民国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率》,《中国人口科学》2003 年第 5 期。

⑤ 侯杨方:《民国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率》,《中国人口科学》2003 年第 5 期。

间和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张力;长者自身也逐渐内化“年迈老衰”的身份。然而,形成于短寿时代的三段周期并不适合长寿时代。在短寿时代,15岁及以下和60岁及以上的人口均被视为被抚养人口,即人们在15岁后便可正式进入劳动力市场,60岁后则正式退出职场。在长寿时代,九年义务教育制的推行、普通和职业高中的普及、大学扩招和研究生入学率的大大提升,使得低龄人口需被抚养的时间远超15岁;超过一半的青少年人口在22岁左右才会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博士则在30岁左右才会自立。相反,老年阶段几乎占到个体生命历程的1/3,但实际需要赡养的时间却不长:60岁及以上人口生活不能自理者不过5%,其日常生活需要帮助的起始年龄约为70岁。

这意味着,现有人生三阶段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sup>①</sup>;长者被退休、被保障、被优待等旧思维、旧做法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调适,三阶段模式亦应被改写。应使长者能够通过终身学习、继续工作、参与志愿活动和休闲娱乐活动等,继续有效地融入经济社会生活中,在生命历程的后一阶段,依然可以实现个人价值、提升自我效能感。同时,他们的智慧与价值若能得到社会的真正承认,便可构成长寿时代长寿红利的源泉。

## 二、长寿红利的资本底蕴

21世纪是一个发现长者的世纪。人口红利和人口机会是近年的社会热词,二者均强调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价值。而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社会上普遍盛行人口红利消失的悲观情绪。然而,在长寿时代,长者身上蕴含着丰富的“长寿资源”;这些资源若能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即可形成巨大的“长寿红利”。长寿红利是在后人口转变时期,寿命的延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正向效益,即因长者规模扩大所产生的消费以及社会参与对经济增长形成的直接或间接推动作用<sup>②</sup>;低龄长者身上蕴含的生产性资源,更可能激发的新的经济奇迹。寿命的延长重塑了传统“学习-工作-养老”的三段式人生模式,人们可有更长的学习时期、工作时间和老龄阶段。长寿奇迹可抵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长寿红利的最大化,便是老龄化对经济负面效应的最小化<sup>③</sup>。

长寿资源主要表现在人口数量(人手)、人口素质(人才)两方面。“十四五”“十五五”时期是我国老龄人口“爆炸式”增长之时,70岁以下低龄长者的总量将十分巨大。2020年,60-69岁人口共1.47亿人,占60岁及以上人口的55.8%;2050年,低龄长者规模将高达2.09亿人,占60岁及以上人口的43.0%<sup>④</sup>。他们教育程度提升,多数人身体健康,继续就业或再就业意愿强,构成长寿红利的人口基础。对此,学界已有较多讨论,本文仅聚焦于长者的资本禀赋(即人口“质量”),分析长者素质提升所蕴含的长寿资源。

### (一)人力资本日渐丰厚

教育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2020年,中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受过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人口达2.2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5.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54%。其中,长者的平均教育年限超过6年、城镇男性长者超过9年,达到初中水平;高中及以上学历程度者占13.9%,比2010年增加了2085万人、提高了5个百分点。随着1960年代后出生人口渐次步入老龄队列,低龄长者的教育资本还会持续改善,生产性潜能还将稳步提升,加之长者内部的新老更替,长寿红利的机会窗口可由此开启。

① 陈东升:《长寿时代的理论与对策》,《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

② Zuzana, Joniaková, Jana, et al., “Age Management as Contemporary Challenge to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Slovak Companies”, *Procedia Economics & Finance*, 2015(34), pp.202-209.

③ Scott A. J., “Achieving a Three-dimensional Longevity Dividend”, *Nature Aging*, 2021,1(6), pp.500-505.

④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2019),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 Online Edition, Rev.1.

长者曾是“智者”，是人类知识和生产经验的创造者、继承者和传播者，他们用生命长度和生活深度编织了独特的经验价值<sup>①</sup>。长者在长期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与技能，是弥足珍贵的人力资本。该优势也使社会启用长者的人力成本远低于培养新人的成本；年长员工和年轻员工同行，有利于“隐性知识”的代际传承<sup>②</sup>。相比年轻人，年长员工的流失率低、出勤率高、事故率低、对企业的忠诚度也高，更愿分享知识和经验；在知识密集机构，长者累积的教学和研究经验，是个人更是机构和社会的宝贵财富<sup>③</sup>。

长寿时代本身就是健康资本改善的结果。如前所述，我国在 2000 年前进入长寿国家行列后，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提高，2019 年为 77.3 岁。2020 年，女性平均预期寿命首次突破 80 岁，达到 80.9 岁。尽管长寿不等于健康，但延长的寿命并非都是无效寿命，今天长者的身体素质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好，生命力、生产力、思维力、创造力都可延续更长时间。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人的健康预期寿命达 68.7 岁，占平均预期寿命的 89.8%，趋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020 年，60 岁女性的平均余寿为 24.3 年，60 岁男性的平均余寿为 20.7 年，分别占两性出生预期寿命的 27% 和 30%<sup>④</sup>。而且，超过一半长者在去世之前，各项生活自理能力基本完好且保持稳定，中低龄长者多能过上活跃、有意义的生活。

### （二）经济资本大大提升

经济资本可从经济的独立性与衍生性两方面进行分析。随着养老保险制度的深入推进，城乡长者大都可获得各种形式的养老金。201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主要依靠家庭成员供养的长者不足四成。这个数值虽然依旧不低，表明家庭仍是众多长者经济生活的重要承担者，但它比 2005 年下降了 20.4 个百分点。而且，随着农村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和后小康社会脱贫巩固率的提高，我们有把握研判，长者的经济独立性不仅会随之提升，且其日常经济生活来源的稳定性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经济资本的改善，有助于促进长者的消费或储蓄，助推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即老龄产业、老年产业，是指随着人口老龄化而产生的专门为长者消费服务的产业。长期以来，长者在消费方面较为保守。一方面，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的他们，经济上难以自养，多完全或部分依靠后辈供养。经济的不独立性与经济来源不稳定性决定了他们在消费方面难以行从心愿。另一方面，即便有独立且稳定的经济来源，在多子女时代，他们更会考虑后辈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福祉。而在少子女且经济来源更稳定的长寿时代，长者的消费行为或会随之改变。长寿时代的到来与经济资本的改善相叠加，长者消费群体将越发庞大；消费意愿、消费行为的改变，将会推动“银发经济”的蓬勃发展，老年产业也将成为“朝阳产业”。

### （三）技术资本持续增强

技术资本是一个新的概念。与长寿时代同步，21 世纪也是一个以互联网为基本特征、信息技术拥有赋权、促进社会参与和延展社会网络等功能的数字时代。当前，数字技术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长者的网络参与已成为生产性老龄化的重要形式。他们在网络中消费、交友、娱乐，通过互联网进行有偿劳动和志愿活动。《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在 1997 年到 2021 年间，中国网民规模从期初的 62 万人发展到期末的 10.1 亿人，网民普及率已占中国总人口的 71.6%；在全体网民中，50 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从 1999 年的 1.6% 增至 2021 年的 28%；60 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也从 1999 年的 0.4% 增至 2021 年的 12.2%，增幅巨大。

① 邬沧萍、杜鹏：《老年价值论》，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9 年，第 74-92 页。

② Wuestner C., “BMW Finds New Ways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with Aging Workforce”, <https://www.awtonews.com>, 访问日期：2022 年 2 月 1 日。

③ 杨团：《从“负担”到“财富”》，《人力资源》2013 年第 3 期。

④ 王广州：《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预测及其面临的问题研究》，《人口与经济》2021 年第 6 期。

2019年上半年,50-59岁、60岁及以上年龄组的网民群体人均手机APP数量已分别达到40个与33个,并在网上进行多样性的活动。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发布的《中老年人网络社群生活现状研究报告》显示,在使用微信的中老年人中,功能使用的排名依次为社交类功能(96%)、支付类功能(85%)、信息类功能(67%),线上支付惠及中老年人日常生活服务,微信已经渗透到中老年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数字时代和长寿时代,长者自身对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的践行,都需要数字能力的支持;反过来,数字技术也成为实现积极、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手段,长者的健康、参与与保障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影响。<sup>①</sup>

#### (四)社会资本不断延展

随着人力、经济和技术资本的持续改善,长者的社会资本范畴与获得途径也不断拓展。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存在于人际关系结构与社会结构中,表现为社会网络、规范、信任、权威、声誉、人缘、口碑、行动的共识以及社会道德等诸多方面。无形的社会资本可给个人或群体带来收益。

社会网络可分为初级、中级和次级,由此形成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初级社会资本源自基于血缘与亲缘构成的社会网络。在少子化时代,大家庭已较罕见,这类资本大大削减。中级社会资本源自基于地缘形成的社会网络。与初级社会网络及其所构成的社会资本类似,在城镇化过程中,乡土中国的衰落、城市中国的私密追求,以乡土为连接的中级社会资本也大大淡化。但是,与此同时,因业缘、趣缘等形成的次级社会网络及其蕴含的社会资本却大大拓展;换言之,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在不断凋敝乡村的同时,也加强了因劳动力市场参与形成的职场联系以及因志趣相投而形成的趣缘连接。这些连接因数字技术而会长久维持并不断更新,既可加强长者与外界的联系,扩大他们的社会交往面,维持身心健康,也可为他们聚拢更多的社会资源。

总之,在长者群体内,队列的更替和年轻长者各类资本禀赋的持续改善,人口质量的大大提升,均有助于增强他们的劳动参与意愿,推动由参与率向生产效率的转变,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长寿资源”。重新审视、看待和对待长者的既有思路与制度安排,合理挖掘他们身上潜藏的资本禀赋,构建更加包容、友好、“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长寿社会”,将是长寿时代持续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势能。

### 三、长寿红利的开发路径

2021年,中国已进入中度老龄社会,未来二三十年将进入深度老龄社会,成为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通常,提高生育水平、延迟退休年龄是应对老龄化挑战的主要手段,前者可降低长者的占比、延缓老龄化峰值出现时点,但无法降低其绝对总量;后者可撬动长者的潜在价值、激发他们继续贡献社会与家庭的潜力。在长寿时代,更应鼓励、支持长者继续参与社会,撬动他们的潜在价值和蕴藏的多元红利。

“参与”是开发长寿红利的重要路径。1980年代后期,学者即已开始讨论长者参与的话题,但彼时,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还很年轻,社会各界主要聚焦于人口的过快增长,故长者参与理念多是出于对个体自我实现的考量。在长寿时代,不仅长者自身具有更强的参与意识,且时代也需要他们更积极、更普遍、更深度的参与。目前,学界已从观念变迁、制度建设、经济常态<sup>②</sup>、公共治理<sup>③</sup>、积极老龄化<sup>④</sup>、

① 杨菊华、刘铁锋:《数字时代的长寿红利:老年人数字生活中的可行能力与内生动力》,《行政管理改革》2022年第1期。

② 牟新渝:《以经济发展新常态为契机释放长寿红利》,《社会福利(理论版)》2015年第10期。

③ 陆杰华、汪斌:《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新动向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6期。

④ 陆杰华、林嘉琪:《长寿红利时代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战略视野及其行动框架》,《行政管理改革》2022年第1期。

教育培训<sup>①</sup>、居住安排<sup>②</sup>、生命历程、人生规划<sup>③</sup>等方面讨论了老年红利的开发路径,笔者将以“参与”为核心话语,从“三度”(长度、宽度、高度)视角,来思考和探索长寿红利的开发与利用。

#### (一)延长长度:渐次延展个体生命周期的生产性年龄时长

随着寿命的延长和人力资本的改善,越来越多的长者有继续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意愿,低龄长者尤其如此。这种意愿有利于长者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理论设想行得通、办得到、可落地、能推进,有利于扩大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增加人力资源数量,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活力<sup>④</sup>,而这一新活力既是长寿红利的体现,也是释放长寿红利的手段和路径。

在长寿时代,必须突破人生三阶段的传统划分模式,通过推行男女同龄退休(除特殊情况外)、延迟退休年龄,把低龄长者真正纳入劳动年龄人口,延长个体生命周期的生产性年龄时长。国际社会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定义是15-64岁,但我国的退休年龄比该定义早5-15年。而教育资本的改善,普遍推迟了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当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年龄不变,受教育程度越高,实际工作年限则越短。低龄段人口的就业延迟与高龄段人口的职场早退,劳动年龄的底端和顶端双向挤压,使得我国人口的实际抚养比高于统计抚养比。在长寿时代,必须通过退休年龄的调整,把生产性年龄的上限向后挪移<sup>⑤</sup>,弥补更晚进入职场的时间,形成“上学更长、寿命更长、工作更长”的人生新格局。

2013年,中国政府即已提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2021年,国家出台了落实延迟退休年龄的初步方案。随着在1960年代中国出生人口最高峰时期(年均出生人口约2500万人-3000万人)出生之人即将进入60岁,现行标准下的劳动年龄人口将持续缩减。但是,若在未来30年内,根据我国人口发展态势顺势而行、顺事而为、顺时而动,以弹性和有一定区间选择的模式,首先实现男女同龄退休,继而将退休年龄渐次推延至65岁,把50/55/60-64岁女性和60-64岁男性人口转变为劳动年龄人口,是收获长寿红利的最直接路径,可替补劳动力资源的结构性短缺、降低老年抚养比、减轻已然难堪重负的养老金压力,满足多数长者不服老和自我实现的诉求。

#### (二)拓展宽度:着力激发个体多维资本禀赋的潜能

长寿红利具有多面向性。这种多面向性要求多维度开发长者的各类资本禀赋,多层次地促进他们的社会参与,增加他们的社会参与面。长寿时代与数字时代的交叠,可为长寿经济形成助力,弥补长者体力劣势,赋能他们继续参与社会生产与价值创造。

一是注重多种类型的社会生产。在现阶段,长者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续聘、返聘、再就业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继续在原部门或转到其他部门,从事农副业、工商业、新型服务业、专业技术、文教卫生、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生产性劳动,亦可参加纠纷调解、环境卫生监督、交通管理、治安联防和居委会等社区性工作。由于城镇中老年妇女退休更早,故尤其应注重发挥她们的作用。

二是注重家庭参与的社会效应。延长退休年龄,有助于撬动长者的生产性潜能,直接带来生产性红利,但长寿红利也包括长者的家庭贡献。进入老龄阶段的个体迟早都会退出劳动力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价值和贡献就此消失。相反,他们只是从公共空间转入私人空间,承担起更多的家庭责任。他们对配偶和家人的照护,使子女可从家事中抽离出来,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工作中,由此提升工作效能与创造力,而这恰是家庭参与带来的(间接)长寿红利。

三是注重消费参与的经济价值。长者的消费行为同样有助于激发长寿红利。消费带来的经济促进也是一种“长寿经济”或“银发经济”。长寿经济不仅局限于老年阶段,它还可触发一系列经济活动,

① 郭秀云:《如何促进老有所为收获“长寿红利”》,《国家治理》2021年第39期。

② 邹沧萍:《长寿时代的空巢家庭企盼亲情住宅》,《住宅科技》2004年第2期。

③ 琳达·格拉顿、安德鲁·斯科特:《百岁人生:长寿时代的生活和工作》,吴奕俊译,北京:中信集团出版社,2018年,第12页。

④ 杨菊华、史冬梅:《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生产性资源开发利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

⑤ 杨菊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视域下的性别-年龄平等红利》,《社会建设》2021年第3期。

包括为年长时消费而进行的筹资与积累,以及为“老有所为”进行的教育投入等。因此,长寿时代的来临正在赋予长者新的社会角色,需要改变工业时代以来的生产组织方式,激发长寿经济的更多可能性<sup>①</sup>。

### (三)挖掘深度:注重发挥长者社会教化方面的智慧

深度是指参与的层次。当前,长者的参与主要限于娱乐、休闲、志愿活动等,跳广场舞和打麻将还是女性长者、打牌下棋是男性长者的重要活动内容。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调查数据显示,约1/3的受访者参与了不同形式尤其是正式的志愿活动。在城镇地区,部分教育程度较高的长者也会参与老年大学。所有活动都有助于长者维持社会网络、保持生命活力与自我效能感;但是,在全部老龄人口中,活动参与者的比例较低;且其参与也多停留在浅表层面,他们身上蕴藏的更丰富的智慧与才能尚未得以施展。

长者是长寿时代新文化的主要塑造者,他们身上蕴含的隐性知识不仅可直接创造经济财富,而且还具有政治、文化、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必须重新认识长寿的意义,消除对老年群体的刻板印象或保护性的歧视,拓展当前以尊老、孝老、爱老为基调的伦理性文化,形成适合于长寿时代的积极的、新型的、更具有包容性的年龄文化。在继续支持他们从事志愿活动时,鼓励并支持他们的创业创新活动,发挥他们在经验传授、文化传承方面的优势。对知识分子阶层,亦可鼓励他们适度参加社情、民情、国情调研,为政府部门工作建言献策,提供咨询。

长寿时代前所未有的,长寿社会的治理工作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同样史无前例。基层作为社会的毛细血管,处于矛盾和问题的最前端,工作头绪多、任务重、责任大、人手短缺,治理工作面临诸多困境。<sup>②</sup>不过,长寿或可为这些基层治理的痼疾带来新的应对机遇。长者生活于社区,与社区联系紧密,热心并多有闲暇,故激发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社区主人翁意识,增强他们的参与行为、引导他们全面参与基层治理,可形成基层治理的延伸之手——借由长者的家庭地位和本地的声望,推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协调社区矛盾,有助于创新基层治理手段,化解基层矛盾,提升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进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 四、简短结语

长寿时代的到来,是人口年龄结构之大变局,标示着人类孜孜以求的长寿目标的达成,人类社会还将在长寿之路上继续行进。本文探索性地提出了界定长寿和长寿时代的标准,梳理了长寿时代背景下长者资本禀赋的改善及其蕴含的长寿红利,尝试性地讨论了长寿红利的开发路径。显然,前所未有的少子长寿时代,与城镇化、现代化、信息化等同样宏大的社会背景密切交织,构成当下社会全新的、重大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不仅关乎个体福祉,而且也是人类的共同命运。同时,人口年龄结构的逆转,其后果必然会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驱动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型、社会结构的长远变革、制度安排的全面重构。

在21世纪,无论家庭还是社会,中国还是世界,年幼还是年长,都将有更长时间与长者“共舞”。认识长寿时代、发掘长寿时代的长寿红利,是人类文明旅程中的新课题与新机遇。面对这一史无前例的人口形态,国际社会的认识经历了从恐惧、消极到积极的过程,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日本、韩国、美国、德国等,已通过不断推迟退休年龄或其他手段,将发掘长寿红利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虽然国情不同、制度有别,但先发国家的经验与教训,都为我国开发长寿红利提供了参考借鉴。

<sup>①</sup> 陈东升:《长寿时代的理论与对策》,《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

<sup>②</sup> 杨菊华:《家庭转变与基层社会治理关系研究》,《社会发展研究》2022年第2期。



当然,开发长寿红利,关涉个体、家庭、社区、社会等多个层面,需要一系列制度、组织、服务保障以及个体的主观意愿和行为努力。只有社会真正形成“老有所为”的新型制度文化、观念文化,只有长者怀抱更为积极的年龄认同,他们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真正各享其益、各得其美、美美与共;国家也才能在长寿时代的全新时局中把握住长寿红利,开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新篇章。

---

## Longevity Era and Longevity Dividend

Yang Juhua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P.R.China)

**Abstract:** In 2021, th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ly aged over 60 and 65 in China exceeded over 267 million and 200 million respectively, accounting for 18.9 percent and 14.2 percent of China's total population, and the population of those aged 80 and above is also growing rapidly. These numbers indicate that China has moved from an aging society to an aged society. Living up to 100 years is more promising than ever before, and the “era of longevity”, which has never been experienced before, has already arrived.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family and society, China and abroad, young and old, will have a longer time to live with the elderly. Recognizing the longevity era, an unprecedented demographic pattern, and exploring the longevity dividend of the longevity era, are both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journey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fine the concepts of longevity and the longevity era, analyzes the longevity dividend embedded in the largely extended life expectancy, and discusses the path to stimulate the longevity dividend. It proposes that the longevity era is a concept that is more positive and forward-looking than the term of aging era or population aging. It also suggests that in order to stimulate the longevity dividend, it is necessary to extend the working years of individual life by gradually delaying retirement ages, expand the varieties of productivity by inspiring the productive potentials of largely improved multi-dimensional capital endowment of individuals, and explore the depth of productivity by going beyond the participation of Square Dancing or volunteering, and play a role in passing on cultural heritage and political wisdom, etc. With favorable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s well as individuals' willingness and efforts of continuous social participation, the elderly can realize their own values to the family and the society, the goals of self and others can be unified, and thus the world can be harmonized.

**Keywords:** Longevity; Longevity era; Longevity society; Longevity dividend; Aging dividend

[责任编辑:陆 影]